

“疫情大流行”（Pandemia）：学术生活与新冠疫情

理查德·华特梅尔

理查德·华特梅尔（Richard Watermeyer）：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高等教育变革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件：Richard.watermeyer@bristol.ac.uk.

对澳大利亚、爱尔兰、南非和英国的在职学术人员进行的调查清楚地显示了大学所采取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对学术人员工作和生活产生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产生了“疫情大流行”（pandemia）的概念，这是一种广泛共有的状态，描述了在疫情期间学术人员从事大学工作的经历，以及疫情对学术人员个人和职业发展造成的损害。

疫情大流行

“疫情大流行”描述并解释了大学“集体”应对流行病背景下学术人员受到的影响，并为理解全球危机对高等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潜在变革性影响提供了概念性视角。

在这四个国家的疫情大流行应对经验中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点和重叠之处。调查受访者经常表示，他们所在国家的机构在管理和应对疫情大流行方面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商业方式，忽视了员工所应享有的福利和福祉。绝大多数受访者在开放式调查问题中回应并讨论了迅速转向在线工作的过程中，如何产生了相当高的工作强度。然而，这种工作强度的增加似乎没有得到大学内部适当的认可或回应，而大学则将其归因于个人责任。因此，受访者认为大学缺乏关爱和道德，这不仅体现在学校对教师严格的绩效要求上（大流行没有中断绩效考核的要求），还体现在

学术人员的身心健康出现普遍但不同程度的恶化、职业倦怠和人员流失问题上：

“新冠疫情加剧了工作量的不平等，而学校将其视为个人问题……我们在应对这场危机时缺乏创造性的回应……我们试图在更少的资源下做同样的事情，而不是重新思考、调整和创新。竞争精神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灾难资本主义？

机构对疫情大流行的反应也经常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以及大学领导利用危机推动机构议程的感觉。例如，受访者提到，大学的精英管理层如何利用疫情大流行来扩大其权力基础，并认为学术人员在决策过程中的边缘化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地，也探讨了在危机条件下使剥削性工作做法合法化的情况：

“在我的部门，‘道义责任’去抗击新冠疫情的名义被用来操纵员工，从而迫使他们接受在工作量和截止日期方面不合理的要求。结果，我的健康状况恶化到了必须提出辞职的地步，即使在没有其他去处的情况下。我想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

不稳定性加剧

受访者普遍表示，就业不稳定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的行业，使他们感到越来越脆弱。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将“疫情大流行”视为学术界现有下降趋势的延续：

“新冠疫情危机更多地揭示了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剧的问题，而不是制造新问题——不安全感、剥削、管理主义、不合理的期望、薪酬和条件的削弱、学术自由的威胁等。”

新冠疫情下的院校工作经历被描绘为学术斗争和失败的又一篇章，学术职业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和衰退：

“新冠肺炎和数字化工作的要求使人们意识到已经被损坏的事情。当这一切结束时，受苦的人将不再仅是学生，也不再是大学的财政状况。相反，学术人员将受到低估，过度劳累，缺乏工作保障和就业确定性的困扰。”

政府的冷漠和管理主义的增加

受访者的描述中充斥着被忽视、被抛弃的感觉，以及对滥用权力的抗议。在澳大利亚，受访者讨论了他们的国家政府对大学表现出的冷漠和敌意，以及未能支持依赖于国际学生经济流动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直利用疫情危机来证明改变（或减少）大学资金的合理性，而在我所在的高校，它被用来‘掩盖’以前和正在发生的管理不善问题。”

政府在这些账目中的冷漠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大学管理的企业方法变得显著的原因，也是大学领导人忽视员工福利的原因。

在爱尔兰，疫情大流行被视为长期“危机轨迹”的一部分，大学将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置于员工福祉之上。在南非，学术界的处境可能更加凄凉。在一个普遍贫困和电网失灵的国家，大流行的影响尤其严重。然而，与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英国的情况没有区别的是，在这些国家，疫情大流行同样被

归咎于工作场所不平等加剧、管理主义加剧和成本削减措施，这些措施使学术人员面临更大的风险。

领导缺位和共治

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在这四个国家，学者们都声称学院共治和同仁情谊正在复兴。加强集体认同和使命感，在南非被称为“乌班图（ubuntu）”，被认为是对疫情大流行的应对和弥补措施。据报道，在未被领导者“关注”的情况下，学者们首先通过意识到彼此的作用和责任来寻求安慰和解决办法，甚至有案例称之为救命：

“我崩溃了，开始有自杀念头。大学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对我们施加压力。如果不是因为我出色的同事，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由于校园关闭，受访者还认为数字平台有助于促进替代的、更广泛的学院互动形式，这些形式不受时间或地点的限制。

全景下的“疫情大流行”

总的来说，“疫情大流行”清楚地揭示了高等教育面临的多重困境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我们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员工的不稳定尤其与工作的临时性和已经高度竞争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加剧有关。与此同时，几乎是矛盾的是，劳动力流失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变得更加显著，这意味着学术人才正在迁移到其他“更有利”的国际高等教育环境（这也与英国脱欧有关）。疫情大流行还与工作场所不平等的加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心理健康危机以及对大学领导人的信任崩溃有关。

然而，疫情大流行也代表着对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的响亮呼吁，这种领导以价值观

为基础，是协商性的和共享的，而且在最高级别上不畏民粹主义政府的政治敌意。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疫情大流行是复兴的一个阶段：

“就像在政治领域一样，在我所在的高校，高级领导层（只以非常狭隘和庸俗的方式关注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官僚化）的脆弱性及其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充分暴露出来。尽管这本身非常令人不安，但我非常希望这将导致领导层（和领导人）的调整和变化，并带来一个新的开始。”

超越之路？

在高等教育的贡献如此不确定和有争议的时候，关注如何对待那些构成高等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的学术人员，以及管理和领导这

些学术人员的领导层的漫不经心，是当下最紧迫的事情。如果过去两年（甚至更早之前）的忽视继续下去，肯定会导致学术人员的进一步退化，即使是灾难资本家也无法从中获利。然而，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破坏可能被视作一个重建高等教育的良机。对于在大学内部重新建立一种关怀伦理，并支持以人为本的领导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注：本文基于作者对报告：Watermeyer, R. et al. (2021) ‘Pandemia’: A reckoning of U K universities’ corporate response to COVID-19 and its academic fallou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2(5 - 6), 651 - 666. <https://doi.org/10.1080/01425692.2021.1937058>